

〔美〕桑契·德·格拉蒙特 著 贝金译

老书新刊之 谍战系列

群众出版社

秘密战

战



·德·格拉蒙特著 贝金译

利刊之谍战系列

LAOSHU XINKAN ZHI DIEZHAN XILIE

秘密战

战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战 / (美) 格拉蒙特著; 贝金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7

(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

ISBN 978-7-5014-5403-7

I. ①秘… II. ①格…②贝…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2739 号

秘密战

[美] 桑契·德·格拉蒙特 著
贝金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14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403-7

定 价: 45.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老书新刊出版说明

群众出版社作为公安部所属出版社，新中国成立之前叫群众书店，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至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近五十部间谍题材的外版书，为读者较全面地了解神秘的间谍内幕和谍战经典战例提供了丰富史料，进而形成了群众出版社的出版特色。这批书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有些限定在内部发行，购买时要凭相关单位的证明和工作证。至今，仍有很多老公安政法干警记忆犹新，当时，为了购买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许多人在公安部8号楼排队一直排到长安街路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图书的名字与群众出版社密不可分，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近年来，随着谍战影视的热播，人们阅读间谍题材图书的热情逐渐升温，图书市场上间谍题材的小说颇受读者青睐。但同时，也有一批读者渴望读到真实的纪实性谍战类图书。这类书由于多年未加印，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就连一些旧书网店都很难淘到。今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群众出版社通过

整理档案资料，首批出版“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七部。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自从决定出版之后，经过多方联系著者、译者及原出版者，由于时隔三四十年，始终没有音信，其间我们还求助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最终群众出版社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签订稿酬转付协议，望相关权利人或知晓线索人士与群众出版社联系。

群众出版社

二〇一五年七月

原书出版说明

《秘密战》是1962年美国纽约普特南之子公司出版的。作者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他以自己的观点介绍了美、英、德、苏等国间谍特务机关的组织、首脑人物和活动情况，并用很大篇幅叙述了他们之间的隐蔽斗争。此书可供有关单位和研究人员参考，对广大读者也有阅读价值。

目 录

全面的间谍活动	1
回 顾	28
朱迪·柯普朗	
——谈情说爱的特务	48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暗斗	78
国家安全局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伙伴	114
美国和俄国的“魔术”	125
鲁道夫·阿贝尔	
——一位画家的真面目	145
被斩掉双翼的U-2型飞机	174
流年不利的英国	212
“我喜欢的是敌人叛变，但不喜欢叛徒”	
——奥克太沃斯·恺撒	270



逃出自由世界的人	307
外交人员、军人和间谍活动	333
德国	
——飓风的中心	382
间谍工作的未来	419
结束语	432
附录	436

全面的间谍活动

1955年，美国“情报差距”所引起的焦虑曾促使胡佛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小组对中央情报局进行了调查。这个专门小组建议，“在制定政策时，应更加大胆”。小组曾就美国的情报工作同苏联的情报工作做了一番对比，认为苏联“相形之下，比较容易地搜集到我国的重要机密”，而美国在这方面则盲目摸索。小组建议，应更“乐于承担某种预见到的政治和外交风险，并充分利用技术人才”。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提出建议后的六年中，这些建议都已付诸实施，而且大大超出了该专门小组的期望。在对古巴采取了冒险行动和U-2型飞机越境飞行事件发生以后，谁也不能再指责中央情报局胆小怕事了。这些日子，把中央情报局说成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怪物，倒成了一时的风气了。弗莱德·库克曾在1961年6月24日《民族》周刊上写了一篇“揭露”中央情报局的文章，他

总结说：

总统谈的是和平，但中央情报局却在推翻政权，策划内部破坏活动和革命，对友好国家暗派鸦片种植者，指使军事侵略行动，支持右翼军国主义者。这一切都不是一个自称为具有崇高理想、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所应采取的行動。这一切都是披上右翼外衣的共产国际的行径。

库克表达了许多人的那种震惊心情，这种心情是人们在获悉美国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维护和平的基础上但暗中又在煽动战争时，必然会产生的。

然而，同样出乎意料的是，局面的彻底扭转只花了六年时间。在1955年，问题是如何使中央情报局放手去干，因为这个机构没有提供足够的情报，特别是有关铁幕后面的情报。而在1961年，问题却变成如何去限制中央情报局的活动，防止它再招致另一次古巴惨败，使美国摔大跤。如果我们记得中央情报局在情报工作领域中不过是一个新建机构，那么，对于美国情报部门的力量和它的大胆行径就会感到更加惊讶了。中央情报局建于1947年，但是到了1950年才真正开始工作，艾伦·杜勒斯就是在这一年加入这个机构的。

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中央情报局已经成长起来了，就像一个娇弱的孩子在青春时期就成了地方上的一霸一样。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时期也正是冷战时期。

与此同时，苏联的情报工作也不是停滞不前的，杜勒斯本人有一次就曾说道：“我参加中央情报局以来，曾经审阅过许多有关共产党阴谋的确凿证据。”苏联间谍在美国进行活动已经有四十多年，而苏联遍布世界的间谍机构也都为进行冷战全力以赴工作。

古巴和U-2型飞机事件，已经使舆论隐隐约约地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为了对抗苏联，美国就像苏联一样，正从事全面的间谍活动。固然，在制造导弹方面，美国正在同（或力图同）苏

联一比高低，就是在秘密的情报战方面，美国也正在同苏联争一日之长短。苏联情报部门所使用的手法，美国情报部门差不多也都能运用自如。两大集团的情报部门，都组织严密，力量强大，而且也都在秘密和冷酷的气氛中进行工作。

苏联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都在相互指控，都把对方说成是最大的组织。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 А. И. 谢列平（当时是艾伦·杜勒斯的对手）早在 1959 年就在《真理报》上写道：“资本主义各国的间谍机构，特别是美国的间谍机构，都在不断扩大。例如，仅就中央情报局这一机构而言，它现在就雇佣了两万多人，每年动用十五亿以上的美元。同战后的头几年相比，美国反间谍工作的规模在近几年已增加为原来的十二倍。”杜勒斯在对记者所发表的仅有一次的公开谈话（载于 1954 年 3 月 19 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说：“在这方面（间谍网的数目），苏联情报部门当然是领先的。他们在世界各重要国家吸收和使用特工人员，同时还通过他们的‘外围组织’，控制更多的人员。”在另一篇演说中，杜勒斯又说：

为进行间谍和秘密政治活动，苏联拥有的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为数之多超过任何国家历来所掌握的人数。在莫斯科、布拉格、北平以及其他共产主义中心，他们正在训练从许多其他国家招募来的特工人员，然后把他们当做共产主义的使者派往世界的多事地区。中东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非洲，都列在他们的目标名单上。他们也没有忽视我们这个半球，最近所揭露的共产党在墨西哥的阴谋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在针对间谍部门的罪恶所提出的指控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双方类似的论调。苏联新闻局的小册子《当场捕获》（这是 1960 年发表的指责中央情报局的一本小册子，一位美国情报官员给了我一本，他评论说：“这不是《圣经》，但它的确有一些很不错的材

料。”)就这样说：“美国所进行的间谍和颠覆活动确已成为全面和全球性的了。这种活动包括偷听电话、翻译外国政府的密码电信，甚至派遣特务和间谍飞机、策划各种阴谋和武装政变，公然粗暴地破坏他国的主权。”

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编写的小册子《共产党间谍活动的方式》中则有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贸易和其他使团，过去和现在都被当做合法的掩护，用来掩盖国际共产党间谍网……共产党国家的外交、贸易以及同类性质的使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久经训练的内务部和军事情报机关的行动人员组成的……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采用讹诈、恐怖和其他不可饶恕的手段……也可以找到某种证据证明苏联正在利用国与国之间的交换计划来支持其间谍活动。

J. 艾德加·胡佛在1960年的拨款申请中，就曾对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说过：“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我们的调查已经清楚地表明，苏联集团为反对美国而进行的情报活动已有了全面的扩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就负责遏止苏联针对美国所进行的间谍活动。

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第一个有组织的间谍机构就是在苏联驻美贸易处的掩护下建立的，这一贸易机构于1924年在纽约成立了办公处。在对付共产党间谍方面，联邦调查局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经验。而美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的渗透，则是一项新近才发展起来的工作。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1954年背叛的苏联内务部特工人员——就曾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发表这样值得注意的声明：“作为一个职业的国家保安官员，我工作了二十一年，在这二十一年中，我始终没有碰到一件外国间谍在和平时期在苏联进行活动的真正案件。在没有提供丝毫证据的情况下，成千上

万的人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并被枪决……在苏联，我始终就没有听到过一个案件可以同发生在美国的富克斯和纳恩·梅案件、格林格拉斯案件或戈洛斯案件，发生在瑞典的安德逊和思荷姆案件或发生在日本的理查德·索奇案件相比。然而，根据苏联当局不断提出的警告，似乎苏联从上到下都布满了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务，因而只有永久地、冷静地保持警惕才能使苏联免遭毁灭。”

美国正以不亚于苏联的精力和决心进行一场情报战，这一事实的被揭露，不仅粉碎了人们为“道义”进行冷战的错觉，同时也粉碎了人们对“无神论共产主义”进行十字军讨伐的错觉。当公众得知放冷箭这种做法并不是苏联专用的战术时，有一部分人就对中央情报局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央情报局使用诡诈和“卑鄙手法”的种种事实已使它同苏联的间谍机构难分黑白。然而，在错觉破灭的时候，在自由社会里怎样建立有效的情报组织的各种问题也就出现了。

美国在冷战中的政策一向是承认社会开放的种种危险，并力图在国家安全、基本自由、对外政策以及情报活动等方面保持平衡。这种政策有时候使我们的总统陷于窘迫的境地。我们最近两届总统都曾经公开地为间谍活动开脱，而在历史上我们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的元首采取过这种做法。在 U-2 型飞机被击落以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承认，他亲自批准了利用一切可能手段获取情报的政策；而肯尼迪总统也曾两度由于古巴事件弄得窘迫不堪。1961 年 4 月 13 日，也就是入侵古巴的前五天，他不得不口是心非地保证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决不插手干涉以促成卡斯特罗的垮台，他将尽一切可能“保证美国人决不卷入古巴周围的反卡斯特罗行动”，同时他“反对”从我国“发动一次攻势”去反对卡斯特罗。总统并没有说谎，因为 4 月 18 日在吉隆滩登陆的叛乱武装中并没有美国人。而且这次攻势也不是从美国发动的，而是从尼加拉瓜沿岸的岛屿上发动的，这些岛屿于 1916 年为美国所租借，为期九十九年。然而，肯尼迪先生当时的态度就好像一位以每小时八十英里

的速度驾驶汽车的人的态度一样，当这位驾驶汽车的人遭到警察的阻拦时，他竟若无其事地回答：“噢，警官，我总共还没有开上一个小时呢！”

中央情报局是这次冒险行动的主角，这一事实被揭露以后，我们年轻的总统便把责任揽在身上，就像他的前任在 U-2 型飞机事件中把责任揽起来一样。但是从此以后他对社会开放的信念大为动摇，竟然向报纸发行人建议实行新闻自动检查制的办法。

4月27日，也就是对古巴事件感到犹有余痛的时候，肯尼迪先生向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说了这样一段话：

事情真相是，我国的敌人就曾公然夸口，说他们通过我们的报纸就能取得那些必须雇用特工人员进行盗窃、贿赂或欺骗等手法才能取得的情报；事情真相是，我国为抵抗敌人的活动而暗中进行的各项准备，都一一为每个报纸读者所了解；事情真相是，我们的部队和武器的规模、实力、地点和性质，我们使用部队和武器的计划和战略，都在报纸上极其精确地披露出来，以致任何国家都感到满意；事情真相是，至少有一次，由于公布了我们所掌握的秘密机械的细节，使我们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改变这种机械。

目前，在看到一篇报道的时候，每一家报纸都会问问自己：“这是新闻吗？”我现在的建议，请你们一定要加上这样一个问句：这对国家有利吗？

有一位情报官员对作者说，1961年1月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特别使肯尼迪总统感到烦恼，这篇报道以人们不愿看到的危地马拉的雷塔卢勒奥这个地名为标题。《纽约时报》的通讯记者保罗·P·肯尼迪（与肯尼迪总统没有亲戚关系）传出了关于中央情报局为即将发动的攻势训练古巴叛乱武装的消息。他说：在离太平洋数英里的科迪勒拉山的军营和小型隐蔽飞机场，

“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外国人员，正在训练突击队使它们掌握游击战术”。他又说，他们进行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使古巴爆发一场危地马拉人认为无法避免的冲突”。像这类的新闻，总统显然认为是不宜发表的。

苏联人曾力图揭露一个“开放的”社会所摆出的问题。根据《当场捕获》这本小册子，“美国政客们为美国情报活动辩护而提出的”理论，“只是拙劣的宣传把戏，它不值一驳。大家都知道，各国政府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国家机密。美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如果考虑到有关方面目前针对中央情报局所发出的叫嚷，考虑到作为古巴惨败的余波而出现的人事和组织变动，其中包括该局首脑艾伦·杜勒斯的更换，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苏联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软弱无力的。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开放的，西方的情报和反情报工作便有两类永远不易解决的问题：

1. 西方情报易于获取，苏联集团情报难以获取。在间谍活动中以打击纳粹党人而名噪一时的艾伦·杜勒斯，就曾说过：“同我们目前所不得不面临的情况相比，德国是微不足道的。”杜勒斯先生还曾指出，“对苏联人来说，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西方的情报都是明摆着的，你只要弯下身来捡就行了。”

苏联的背叛者曾估计过，驻美国的一位苏联武官，只要开口去索取，就可以取得他所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材料。只要付出一笔微不足道的代价，美国政府印刷局就会送上这样的文件：美国港口设备、飞机场的大小和地点、美国矿藏一览表、退伍军官名册。总而言之，实际上他们会送上任何东西，从“如何拧螺丝钉”一直到“如何制造原子弹”。美国内政部地质勘探局的地图资料处，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它提供全美的地形图。订阅《航空周刊》和《原子科学家公报》之类的专门杂志的机会，他们绝不肯放过。苏联的外交官也参加工业大会。1959年在洛杉矶召开的西部电业会议上，两位苏联外交官就搜集了大量文献，多得无法带走，不得



不雇用一辆客货两用汽车。据估计他们带走了重达两百五十磅的文件。像《驾驶员手册》或陆军工兵所出版的装订成十八卷的港口设备之类的出版物，在苏联肯定是会遭到禁止的，而在美国，则人人都可得而有之。

1960年4月，海军中将海曼·G·里科佛对国会原子能两院联合小组委员会说，一位玩具制造商生产了一种北极星式原子潜艇的模型，这个模型极其精确，以致“一位高明的舰艇设计师只要在那个模型上花上一小时的工夫，就可以对人说他毫不费劲地就取得了价值千百万美元的情报”。

贴在那个仅值两美元九角八分的玩具上的说明这样写道：

弹道导弹核潜艇是另一组严格按照美国海军正式蓝图的规格制造出来的模型。通用动力公司电船部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整套的精确资料，谨借此机会向该部致以衷心的感谢。没有该部的合作，制造绝对精确的模型是不可能的。这具模型具备这类潜艇的全部内部设备，包括原子反应堆、控制室、水手间以及两枚北极星式导弹。这具模型在每一点上都与实物无异，比例尺是1：300。

里科佛海军中将说，他感到“惊讶不已”，这种模型居然会拿到市场上来出卖，因为“如果我是苏联人，我会非常感激美国这种慷慨的做法，我以两美元九角八分的代价就获取了这种情报”。这位以“原子潜艇之父”著称的海军中将说，这具模型在装置反应堆的舱面大小方面以及在操纵这类潜艇的水手人数方面，都提供了精确的数据。然而，有人就里科佛海军中将所提出的抗议，征询一位欧洲科学家的意见时，这位科学家则说：“纵使俄国人能够取得原子潜艇的蓝图，这批蓝图也是不值一偷的，因为蓝图太多，需要一座高达三层的建筑物才装得了。而且，在你取得这批蓝图之后，为了更快和更节约地制造自己的潜艇，你得费很大的事才能把各种规格改成米突制。”

这位欧洲科学家，最近从苏联旅行归来，他宣称，俄国人发表的科学情报比美国更多。他说，关于原子基地和导弹的发展情况可以自由取得，苏联人甚至还发行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大概是“美国的先锋式导弹，它为什么失灵，如何才能把它发射出去”。

然而，其他科学家却注意到，苏联人对于他们的原子工厂却遮盖得非常严密。他们用假名来掩盖原子能机构。比如说，相当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苏联机构，就用了“中型机器制造部”的名称。

但是，苏联的科学家却到美国来参观美国的原子能设备。最近就有一批苏联科学家，在主管原子能利用的中央管理局的首脑 V. S. 叶美里扬诺夫的率领下，用了二十一天的时间周览了美国的原子能设备。里科佛海军中就将亲自领导他们参观了匹兹堡附近的希宾波特原子能动力站。随后他们又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伊利附近的恩里科·费米动力站，紧接着又参观了阿贡尼国家试验所，在这里苏联人观看了反应堆，研究了制造钚燃料元素的程序。叶美里扬诺夫先生怀着敬畏的心情注意到“工作是通过戴着手套操纵的气门进行的”。这批苏联人又参观了洛斯阿拉莫斯地区伯克利的奥克立治原子城，向他们介绍了注射原形质，然后把原形质保存在一个磁性槽里的新方法的具体情况。在参观过程中，有一位苏联科学家高兴地说：“我们把原子反应堆放在长方形的建筑物里而你们则用圆形的建筑物，其余一切都是相同的。”美国的科学家只能相信这位苏联科学家的话，因为美国科学家始终就没有得到全面参观苏联设备的机会。

彼得·阿克塞尔是伊利诺大学的物理教授，1959年，政府请他筹划苏美科学家的互换工作。这次经历使他感到非常为难。他说，苏联人并没有为苏美互换科学家这件事作出什么规定，而且“尽管我做了一番努力，也无法得知在苏联究竟由谁来发出互换的邀请”。而在美国这一边，他发现：“根据苏联的过去做法，令人怀疑苏联人是否企图在某些技术和科学领域中破坏互惠主义。”

爱德华·特勒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物理学家，在发展氢弹方面起